

# 暴君抑或雄主：汉武帝在宋代的历史形象考察

孙颖涛

(武汉大学 国学院, 武汉 430072)

**摘要:**汉武帝在宋代的形象存在暴君和雄主两个偏向,这既与汉武帝本身的复杂性有关,也与宋代儒学复兴的思潮和民族对峙的时代特点有关。宋代知识界的整体背景是回向三代和致君尧舜,其主流思想贬抑汉武帝为近似秦始皇的暴君。而宋代帝王、新党官员群、南渡官员群则基于现实政治考量和挽救危机的目的,片面地和功利地肯定和凸显汉武帝的雄主形象。对汉武帝这样功业高出百王的伟大君主,主流知识界以暴君视之,反映了中国人崇尚王道、贬黜霸道的传统观念,这也历史地揭示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根据。

**关键词:**汉武帝;宋代;历史形象;王道;霸道

**中图分类号:**C933.2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6)05-109-06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5.015

现代影视传媒塑造了一个才智卓绝、功业盖世的汉武帝,以致在普通人心中他似已成为古代帝王中的最高典范。然而,回溯历史上对汉武帝的评价,则不免与今人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形成强烈反差。本文以宋儒对汉武帝的评价为例,揭示汉武帝在宋代的历史形象,并探讨其中原因,以期对今日国人有所启发<sup>①</sup>。之所以选择以宋儒的评价为主,一则由于宋代文献留存丰富,遗留较多相关史料;二则较之前代,对汉武帝的评价在宋代似乎突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出现了诸多评价汉武帝的言论。

朱熹、陈亮对汉高祖、唐太宗的争辩广为人知,朱熹主道德而陈亮重事功,二人在帝王评价上形成鲜明的对峙。这一事例实际已透露出宋儒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观念上的两极。一位古代帝王本身可以包含不同的面相,从不同价值立场出发,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评价。

汉武帝本身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面相。对内,他颁行“推恩令”,削减了王国势力,建立中朝,削弱了宰相权力,又设立刺史监察地方,中央集权和皇权均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和巩固。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成为正统思想,汉帝国在政治和文化上空前整合,形成了大一统的盛世局面。对外,汉武帝自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开始

对匈奴作战,经过三次大战,匈奴遭受重创,分裂为五部,已非汉朝敌手。开拓西域、征服朝鲜、勘定闽越、平服西南,都是汉武帝的武功。从这个意义上讲,汉武帝完全可以称得上是“雄主”。

另一方面,汉武帝不仅在个人生活上骄奢淫纵,而且穷兵黩武,屡兴大战,特别是与匈奴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为积累财富满足贪欲以及支持对外战争,汉武帝任用桑弘羊专管财政,以改币制、营盐铁、立平准、行算缗诸法盘剥士民,造成平民富家破产无算;在疆场上,又牺牲了数十万汉家子弟。从这个意义上说,汉武帝也可以称得上是“暴君”。

对汉武帝评价的两歧现象在赵宋以前即已存在。褒奖汉武帝者有之,如班固称其“雄才大略”<sup>[1]212</sup>,曹植称其“功越百王”<sup>[2]</sup>,都盛赞汉武帝的才智和功业。汉宣帝时大儒夏侯胜则认为汉武帝“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亡德泽于民”<sup>[1]3156</sup>。这已是近乎暴君的评价了。宋儒依价值立场的不同也对汉武帝有截然相异的评价:以道德价值为标准的主流思想一方,贬抑汉武帝为暴君;以功利价值为标准的另一方,称许汉武帝为雄主。汉武帝在宋代的两种不同形象,通过他们各执一端的评价透显出来。

收稿日期:2016-05-31

作者简介:孙颖涛,男,湖北安陆人,武汉大学国学院博士生。

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jhun.edu.cn/jhxs>

## 一、暴君：主流思想的贬抑

宋代儒学复兴，知识界的主流思潮是回向三代、致君尧舜<sup>②</sup>。虽然赵宋崛起自五代的衰乱之余，宋初儒者对五代的昏君乱世亲见亲闻，有痛切的近代历史记忆，并且宋初国势远不及汉唐盛世，可是儒者并不以眼前形势自限，反而抱有超迈汉唐、直追三代的宏大理想。在他们看来，三代之世与尧舜之君才是应该追求和学习的榜样，汉唐之世与汉唐之君是不足取法的。朱熹说：“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sup>[3]</sup>正是五代的衰乱历史，激发了宋初以来儒者的救世、淑世之心，希图从根子上提挽、振起斯世，进入一个超越汉唐、媲美三代的仁善境域。而汉唐之所以不足法，是因为汉唐之君个人的善（内圣）远不能和尧舜相比，汉唐两朝作为国家的善（外王）也不能望三代之项背。程颢（1032—1085）就说：“三代之治，顺理者也。两汉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sup>[4]</sup>在宋儒的道德主义视角下，和理想中的三代气象相比，汉唐确实是不足取法的。

在这一思潮背景下，宋儒以个人的善（内圣）和国家的善（外王）两项指标考核古代帝王，站在重内轻外、重德轻兵、人本主义的立场，通过对古代帝王的品评来树立帝王的标杆，进而确立当世的君德帝范，规定国家的发展方向。

传统国家帝王的个人品格和国家命运休戚相关，个人的善和国家的善紧密相连。也就是说，没有杰出个人品格的帝王，根本无以实现善治。宋儒对汉武帝的总体观察是“多欲”（或“穷奢极欲”“骄奢淫纵”），其批评的具体事项则为：“殫奢极侈以竭天下之奉”“穷兵黩武以邀绝域之功”“甘心方士虚诞之说以求不死”<sup>[5]</sup>，亦即自奉奢侈、好大喜功和妄求长生。多欲虽只是帝王个人品格上的问题，但这一个人品格投射到整个国家上，就表现为刘汉王朝作为国家的善的问题。汉武帝多欲的后果是劳民伤财、多杀士民、遗毒无穷<sup>③</sup>。对内，大臣多不得善终，人民生活困苦，无数军士亡命异域；对外，拓边战争带来异民族的灾难，乃至灭人之国。由此观之，汉武帝作为一代有为之君，其个人的善和国家的善都成为问题。

其实，汉武帝的直臣汲黯早就指出，汉武帝的多欲之病与尧舜之道是背道而驰的：“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sup>[1]2317</sup>多欲如汉

武帝必定大事兴作，不能实行清静治国的尧舜之道。宋神宗（1048—1085）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人主举动不当有欲以害政。”<sup>[6]5656</sup>基于对汉武帝多欲的恶劣影响的认识，在君德帝范上，宋儒主张帝王克己修身，以尧舜之君作为效法的榜样；在政治思想上，宋儒远承孔孟，坚持重内轻外、重德轻兵和人本主义的立场。重内轻外是指以福国利民为治国原则，重视国内的秩序维持和人民的福利，不轻启边衅，不开疆拓土。他们认为匈奴为化外之地，得其地不可耕，得其民不可使，取之无益。为了征服匈奴而使国内经济凋敝，人民流离物故，得不偿失。在对待异族侵略的问题上，他们主张“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sup>[1]3834</sup>，反对汉武帝穷兵黩武式的长期战争，认为汉武帝对匈奴必欲灭之而后快的做法，使本来正义的战争失去了正当性。重德轻兵是说在与异族交往的过程中要采取德化为主的方针，不固执地在武力上决胜负。孔子即主张慎战，“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而不是轻易诉诸战争。孟子以为“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孟子·尽心下》）也强调以仁义服人。修德行仁有一定次序，即由近及远，由内而外，先在本国行仁政惠及人民，然后待夷狄以礼，教之以德，以怀柔远人。宋太宗（939—997）说：“治国在乎修德，四夷当置之度外。”<sup>[6]758</sup>这虽是他伐辽失败的托词，却也反映了儒家重内轻外、重德轻兵的思想倾向。而宋儒之所以重内轻外、重德轻兵，其根本的理念坚持和归宿则是人本主义，不论本族或外族，人都应该有生存的权利和尊严。

这一鲜明立场决定了宋代主流知识界对汉武帝秉持以贬抑为主的态度：汉武帝非但不是有道明君，而且是近似秦始皇的暴君。甚至在当时“秦皇汉武”并称连用，成为普通人口头语中暴君的典型。

至迟在宋仁宗（1010—1063）时代，汉武帝已成为帝王的反面典型。宋仁宗时的名臣段少连（994—1039）指出汉武帝绝对不能作为帝王效法的榜样：“且汉武骄奢淫纵之主，固不足踵行其事。而为人臣者，思致君如尧舜，岂致君如汉武哉！”<sup>[6]2651</sup>余靖（1000—1064）更根据“祖有功，宗有德”的原则，指出汉武帝“虽廓地斥境，而亡德及民，不加恶谥，固已幸矣，尊之为宗，无乃失其正乎？”<sup>[7]</sup>徐积（1028—1103）观察到汉武帝为君刻薄残忍，所任用的大臣多不得善终，更明白地痛斥“汉武，暴君也”<sup>[8]</sup>。

这样不加隐晦地直接点名批评汉武帝为暴君,其实反映了宋儒的普遍共识。

且这一共识是由宋哲宗(1076—1100)亲口道出,不容置疑:

苏辙论殿试策问,引汉昭帝变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汉武比先帝?”辙下殿待罪,众不敢仰视。纯仁从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无贬辞。辙以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事之始,进退大臣,不当如呵叱奴仆。”……哲宗曰:“人谓秦皇、汉武。”纯仁曰:“辙所论,事与时也,非人也。”哲宗为之少霁。<sup>[9]10290</sup>

据《宋史》卷三三九《苏辙传》,论殿试策问在绍圣初年。元祐间旧党臣僚多引汉昭帝改汉武帝法度事,以论证元祐更化的正当性。尽管苏辙(1039—1112)可能无意比宋神宗为汉武帝,但此时宣仁高后已死,哲宗绍述势在必行,故不能容忍对先帝神宗稍有微词。哲宗所言“人谓秦皇、汉武”,表明宋人的一般见解是将秦始皇和汉武帝相提并论,而此二人最大的相似之处即在严刑峻法、穷兵黩武。对哲宗而言,以汉武帝比拟其父神宗之所以不可容忍,正是由于汉武帝在普通人眼中的形象决不是一个有道明君。神宗熙宁、元丰间多次对西夏用兵,灵州、永乐之役军民死伤六十余万,时人多以为非,故宋神宗与汉武帝确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这一点触怒了宋哲宗的敏感神经,而宋哲宗的“震怒”正表明汉武帝在普通人心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形象,“秦皇汉武”的俗语清楚地表露出这一含义。范纯仁(1027—1101)所谓“武帝雄才大略,史无贬辞”,只为从中转圜,既非历史事实,也非本人对汉武帝的真实评价。他所说的“辙所论,事与时也,非人也”,意思是说苏辙比宋神宗为汉武帝是考虑到时势和事件的相似性,而不是对两位帝王个人的评价。这也侧面反映了范纯仁本人和宋哲宗一样,汉武帝在他心中的形象同样是一个暴君。

检点史籍,将汉武帝与秦始皇作为暴君并提的言论还有很多,如司马光(1019—1086)言汉武帝“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sup>[10]</sup>。范祖禹(1041—1098)也说:“后世言帝王穷兵黩武、严刑峻法者,必曰秦皇汉武。盖以始皇无道,而武帝亦近似之矣。”<sup>[11]</sup>林之奇(1112—1176)亦言“汉武之所为,去始皇盖无几矣”<sup>[12]</sup>。以滥施兵刑的表象而言,以生灵涂炭的后果而言,汉武帝和秦始皇是极其相似的。这些言论共同表明,在宋人的一般印象里,汉武帝是近于秦始皇的暴君

形象。而宋代主流知识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借历史人物汉武帝表明批评态度,无非是通过对帝王反面典型的批判,希图树立当世的君德帝范,达成宋帝以尧舜为法和自身致君尧舜的理想。

## 二、雄主:片面功利的肯定

汉武帝的个人特质中确实有近似秦始皇的成分,但与秦始皇相比,对他的评价又更为复杂一些。起码在尊崇儒学、实行文治方面,汉武帝是超出秦始皇的,这一点自然能得到宋儒的称许。另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汉武帝坚定反击匈奴,在与异族的争战中取得优势地位;其威制夷狄的烜赫兵威,尤其能获得宋代部分知识分子的肯定<sup>④</sup>。赵宋三百年间与辽、夏、金、蒙对峙,在军事上一直无法取得优势地位,始终伴随深重的民族危机。新儒家的崛起是为了建立道德价值的先天根据,解决佛老带来的文化危机,但是民族危机造成的忧患意识,也逼迫宋代思潮中为功利性的存在留下必要空间。即便不能如汉武帝一样制服异族,保持国家在各民族对峙中的坚强挺立也是理所当然的诉求。是故,在王道受到普遍尊崇的同时,霸道也没有被完全否定;处于不同地位的人在面对不同形势之时,霸道的重要性也被一再提起。这种对霸道以及汉武帝雄主形象的强调是片面的、功利的,甚至与其本人的一贯主张并不一致。既然是片面的、功利的,所以这种肯定也是权宜的、不稳定的,在角色和形势稍有变化时,他们也可能重新回到主流思想上去。

在这种肯定霸道(兵威)的功利思潮中,至少存在三个群体:皇帝、新党官员、南渡官员。他们当然清楚汉武帝暴君的一面,但他们通过给予穷兵黩武以另一种解释,尽量消解汉武帝的暴君形象,为现实政治留下功利的空间。换句话说,他们基于现实政治考量,不得不通过片面凸显汉武帝的雄主形象以肯定功利的必要。

一个国家的盛衰存亡固然跟道德深浅有紧密关系,苏轼(1037—1101)就表达了这种观点:“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sup>[13]</sup>但军事较之道德,更有其迫切性,所以宋代皇帝出于强调军事重要性的考虑,尽管反对汉武帝的穷兵黩武,也有必要凸显其雄主形象,以对汉武帝的兵

威给予一定的肯定。不过,与其他重视功利的臣僚相比,宋帝的见解大多较为持平,在肯定汉武帝积极一面的同时,也仍旧能保持对其消极面的批判。宋真宗(968—1022)就说:“昔汉武事边,逞一时之志,不顾中国疲敝,诚不足慕。然讫孝宣世,天下无事,四夷请吏,亦其余威之所及也。”<sup>[6]1082</sup>他在批判汉武帝疲敝中国之后,沿袭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下》的议论,将汉宣帝时四夷归附的功劳,部分归结为汉武帝用兵的余威。宋真宗之所以肯定汉武帝用兵的余威,与当时宋朝对辽和党项部争战不利的背景有关。作为帝王的宋真宗,虽无意开疆拓土,也不得不以此表示对武事的重视。宋神宗对汉武帝有更尖锐的批评:“汉武帝至不仁,以一马之欲劳师万里,侯者七十余人,视人命若草芥,所以户口减半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岂可如此!”<sup>[6]5656-5657</sup>“至不仁”一语,表明在宋神宗心中汉武帝与暴君并无区别。不过,虽然他谴责汉武帝“视人命若草芥”,但并不因此就对汉武帝彻底否定,而是认为“兵不可不试”,强调战争也有其必要性,可见宋神宗在心底对汉武帝的武功也有一定程度的肯定。可惜他虽志在解决西陲边患,不再贻忧子孙,灵州、永乐之役还是死伤军民六十余万,重蹈汉武帝覆辙。宋孝宗(1127—1194)则艳羨汉武帝的兵威:“汉武帝时,兵威震慑万里之外,又何可当!”<sup>[14]</sup>同时又批评汉武帝用兵“失之已甚”。虽然在儒家舆论压力下,宋代君主批评汉武帝穷兵黩武,但作为帝王,出于对国家尊严和安危的特别关注,在批评的同时,对汉武帝的兵威又能予以适度肯定。他们在强调汉武帝雄主的一面时,怀抱着增强军力、解除边患的期待。不过也有例外,畏敌如虎的宋高宗(1107—1187)就说:“汉武帝乘文、景富庶之后,竭天下之力,不能致匈奴之服;其后五单于争国,自相残灭,而孝宣兵革事力,不及武帝十之三四,足以臣匈奴矣。”<sup>[15]</sup>对同样一件史事,宋高宗与其他诸帝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在他看来,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并不成功,匈奴不是打仗战胜的,而是自相残杀、自取灭亡的。这实际上是他在反驳主战派的抗金主张,为自己的和金政策辩护。这样,诸帝所肯定的汉武帝雄主形象就被他消解了。

新党官员群以富国强兵为号召,也倾向于对汉武帝用兵做积极正面的解释,以凸显汉武帝雄主的面相。新党领袖王安石(1021—1086)本属于儒学主流阵线的人物,三代和尧舜才是他理想的时代和

帝王典范。他曾对宋神宗说:“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唐)太宗为哉?”<sup>[9]10543</sup>可知王安石心中帝王的楷模是尧舜,决不是唐太宗,也不会是汉武帝。可是他却又有与此完全矛盾的举动,邵伯温《闻见录》载:“后安石自著《日录》,厌薄祖宗,于仁宗尤甚,每称汉武帝,其心薄仁宗也。”<sup>[16]</sup>宋人每谓仁宗屈己和戎,在对待夷狄的态度上,宋仁宗在不损及宋朝尊严的情况下能够以和为贵,与汉武帝的穷兵黩武有很大不同;而在王安石看来,这似乎正是软弱和怯懦的表现,远远不及雄主汉武帝的所为,甚为其所鄙。他之所以表现出这样明显的矛盾,正和他鼓动宋神宗平定西陲的目的完全一致。王安石的思想主体仍属儒家,但其个性执拗倔强,是决不甘心对异族有所屈服的,所以尽管他主张师法尧舜,却能肯定汉武帝的雄主形象。另一位官至中书侍郎的新党官员张璪(不详—1093),则把汉武帝穷兵黩武的事实引为“持心坚韧,亦卒成功”的佐证:“汉武用兵三十余年……士马丧亡殆尽,持心坚忍,亦卒成功。今陛下仁圣,但当训练甲兵,以强国势,则驱之可无后悔。”<sup>[6]7880</sup>他的心思和王安石完全一致,都为推动宋神宗用兵西夏而对汉武帝不吝称赞。

两宋之际,中原沦陷,国家处在生死一线的危机时刻,被救亡呼声激起的强兵抗金诉求盖过了主流的道德评价,汉武帝的雄主形象更加凸显。对于南渡后高宗乞和于金的做法,理学家胡寅(1098—1156)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对汉武帝已经不作道德评价:“自古中国盛强,如汉武帝、唐太宗,其得志四裔,必并吞扫灭……竭其兵力而后已。中国礼义所自出也,恃强凌弱,犹且如此。乃今以廉退慈仁君子长者之事,望于尼玛哈,有是理哉!”<sup>[17]</sup>按照儒家的理论,中国为礼义所出,即应“修文德以来之”,即使不能招徕夷狄,也如宋太宗所说“四夷当置之度外”,乃“恃强凌弱如此”,这就与儒家理论相违背了。可是国家近乎覆亡的悲剧,已让大儒胡寅愤而摆脱了儒家的传统主张,对礼义也在所不顾,必欲灭金国而后快,汉武帝英武的一面得到最大的肯定。汉武帝的穷兵黩武的暴君形象被淡化,而威制夷狄的雄主形象得到凸显。在民族危亡的刺激下,儒者已突破传统的儒家思想,为主战论提供理论支持。此后陈亮与朱熹争辩,企图对汉高祖、唐太宗给予一定肯定,而决不肯如朱熹一样一笔抹煞,可看成是后南渡官员同类思想的延续。之所以称他们为后南渡官员,是因为他们如南渡官员一样胸怀

驱逐女真、恢复北宋旧疆的志向。

汉武帝雄主形象的强调是与时局紧密相关的权宜之计,是片面的、功利的肯定,而不是道德的评价。作为一国统治者的宋代帝王,时常徘徊于道与势的两端,既要批评汉武帝的穷兵黩武一面,又要从兵威一面肯定其雄主形象。新党官员群有对抗西夏和恢复汉唐旧疆的愿望,而南渡官员则希望驱逐女真,恢复北宋旧疆。正是这种主观诉求和外在形势逼迫,使他们在对汉武帝整体可能并无好评的同时,能对其兵威予以肯定。我们需要在宋代儒学复兴的整体背景下理解宋人对汉武帝用兵匈奴的评价。在国家政治处于常态下,宋人往往从儒家思想出发,从重内轻外、贵德贱兵、人本主义的立场批评汉武帝的穷兵黩武;而在国家出现危机、强兵和救亡诉求高涨的时候,一些宋代士大夫虽未必整体肯定汉武帝,却能对雄主面相的汉武帝不吝称赞。也即是说,汉武帝的雄主形象在国家遭遇严重危机时就会凸显出来。

### 三、结语

宋儒对汉武帝的两极评价,造成了汉武帝作为暴君和雄主的两极形象。其实暴君和雄主的两面在汉武帝身上都本来存在,但由于出自不同价值的选择,宋儒在这两种形象的认定上出现取此弃彼,偏执一端的现象。宋代主流思想认为汉武帝是近似秦始皇的暴君,但在时代刺激下,特别是出于富国强兵、救亡保种的诉求,宋代帝王、新党官员群、南渡官员群都对汉武帝雄主形象的一面有所强调。正是在这种道德判断和功利判断的张力下,汉武帝的形象得到完整呈现,进而也使一个时代在道德和功利两方面取得相对的平衡。道德性评价作为主流是必须的,但功利性评价作为补充也不可完全废弃。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要依赖深厚的道德造成良善的风俗,而在财富、军事上的功利性追求,则是国家免遭侵略和灭亡的物质基础。在儒家以道德价值为主的价值系统中,适当容纳功利价值(工具价值)是完全必要的,义利之辩永远不会过时,但应随着时代发展对功利保持适度宽容。

在近代百年痛史的刺激下,汉武帝严刑峻法、穷兵黩武的暴君一面也曾被选择性遗忘,这种遗忘在今天仍以某种程度延续下来,所以一度出现汉武帝影视剧盛行的风潮,而还原历史的批评声音却似

乎稍显缺位。我们有必要了解完整的汉武帝史事,适当恢复儒家的声音,以与现实中由于认知不足带来的片面赞美的偏向保持相对平衡。

#### 注释:

- ① 关于汉武帝的研究很多,可参看安作璋、孟祥才:《汉武帝大传》,中华书局2008年版;安作璋、刘德增:《论汉武帝》,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3期;洪煜:《评汉武帝》,载《史学月刊》2001年第4期等研究成果。但目前对汉武帝形象变迁的研究,则暂付阙如。此处宋儒指以儒者为主体的宋代知识分子,至少包括皇帝、官员、学者三种身份。
- ② 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一章“回向三代——宋代政治文化的开端”,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84—198页。
- ③ 郑觐(1022—1072)认为汉武帝为攻伐匈奴,开创了专盐铁榷酤、立平准、税舟车等多种牟利之源,后世沿袭千年,“其遗毒余虐,乃愈于桀纣之暴”。参见郑觐:《郾溪集》卷一八《读史》,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7—279页。
- ④ 这也许正是宋儒热衷评价汉武帝的的原因。由于汉武帝本身比秦始皇更为复杂,主流知识界担心汉武帝作为雄主的积极一面得到凸显,故一再偏重强调其暴君的一面,而重视功利的一方则与之对抗,尽可能凸显汉武帝的雄主形象。

#### 参考文献:

- [1]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2] 严可均. 全三国文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173.
- [3] 朱熹. 朱子语类[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3085.
- [4] 程颢, 程颐. 二程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127.
- [5] 李纲. 梁谿集: 卷一四三·三帝论[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126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602—604.
- [6]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7] 余靖. 武溪集: 卷四·汉武不宜称宗论[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089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32—33.
- [8] 徐积. 节孝集: 卷三一·语录[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101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970.
- [9] 脱脱.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10]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747—748.
- [11] 范祖禹. 范太史集: 卷二七·进故事[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100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320.
- [12] 林之奇. 拙斋文集: 卷一三·二世立[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140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475-476.
- [13] 苏轼. 上神宗皇帝书[M]//苏轼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737.
- [14] 佚名. 宋史全文[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1893.
- [15] 熊克. 中兴小纪[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348.
- [16] 邵伯温. 闻见录: 卷二[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038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723.
- [17] 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535.

责任编辑: 刘伊念

(Email: lynsy@jhun.edu.cn)

## A Tyrant or a Hero: a Study of Emperor Wu of Han's Historical Images in Song Dynasty

SUN Yingtao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Abstract:** Emperor Wu of Han (汉武帝) had two images – a tyrant and a hero – in Song Dynasty, which are connected not only with his own complex personalities, but also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and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among several nationalities at the time. Since Song scholars idealize those times of the Three Generations (三代) and monarchs of Yao (尧) and Shun (舜), mainstream ideology regarded Emperor Wu of Han as a tyrant like the First Emperor of Qin. Nevertheless, Song monarchs and Xindang (新党) and Nandu (南渡) officers, from the view of political consideration and for the purpose of overcoming crisis, highlighted his image of a hero in a biased and utilitarian manner.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which looks upon Emperor of Han, a monarch of significant achievement, as a tyrant,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ntality of honoring benevolent governance (王道) and denouncing domineering rules (霸道). This also historically reveals why China adheres to the idea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Key words:** Emperor Wu of Han; Song Dynasty; historical images; benevolent governance; domineering rules